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系列教材



冷战后的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黄宗良 林勋健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系列教材



冷战后的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黄宗良 林勋健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黄宗良,林勋健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

ISBN 7-301-06547-7

I . 冷… II . ①黄…②林… III . 社会主义国家 - 研究
IV . D0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1813 号

书 名: 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著作责任者: 黄宗良 林勋健 主编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547-7/D·0779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电子信箱: z 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5.75 印张 458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和走势，包括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十几年来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俄罗斯和中东欧各社会主义政党理论和纲领的变化及实践活动，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理论和实践的革新和调整，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和特点。本书的作者包括国内外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罗伊·麦德维杰夫（俄）、高放、殷叙彝、俞邃、郑异凡、姜长斌、陆南泉、黄宗良、林勋健等，他们和一批年轻的专家分别就其最熟悉的内客撰稿。

作者简介

(以其撰章节顺序为序)

王东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哲学系教授、博导)

第一章一

许宝友 (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第一章二

谭荣邦 (中央党校《理论前沿》编译)第一章三、四

毛相麟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章五

高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第一章六

罗伊·麦德维杰夫 (俄罗斯历史学家)第二章一, 关贵海翻译整理

郑异凡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第二章二

左凤荣 (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第二章三

田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第二章四

关贵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第二章五

李兴耕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第二章六

高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第三章一

金雁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第三章二、四

马细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第三章三

谢峰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员、博士)第四章一

曹长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第四章二

王学东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第四章三

伯恩德·伊默 (德国民社党价值委员会成员、博士)第四章四

郭业洲翻译整理

殷叙彝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第四章五

王长勇 (中共中央联络部八局副局级联络员)第四章六

史志钦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第四章七

郝明 (中共中央联络部八局意大利处处长)第四章八

韩隽 (新疆大学法政系副教授、博士)第四章九

刘东国 (中国人民大学国关学院教员、博士)第四章十

2 ◆ 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

- 加藤哲郎 (日本一桥大学政治学教授)第四章十一,唐士其翻译整理
- 姜长斌 (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导)第五章一
- 陆南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导)第五章二
- 俞 遼 (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第五章三
- 王振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第五章四
- 周尚文 (上海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第五章五
- 薛新国 (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第五章六
- 钟伟云 (中共中央联络部处长)第五章七
- 黄宗良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 结束语

前　　言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怎样，是人们所关心的一大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多年以前的“低潮”之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近年来做了一些跟踪研究工作，并于2002年1月举办了“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特别邀请了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教授、德国社民党价值委员会成员伯恩德·伊默博士、日本一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加藤哲郎与会，国内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大等单位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围绕上述主题，按冷战后俄罗斯和中东欧的社会主义运动、冷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冷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的形势和特点四个单元进行了深入和热烈的讨论。中外与会学者给以研讨会充分的肯定。

与会者先后提交论文共三十余篇。

根据与会者要求和教学需要，也根据原先的科研计划，现把论文以教科书形式编辑出版。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内容新。它按国别阐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介绍了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在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政党的变化及其领导的运动状况，总结和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社会党理论和实践的调整和革新，总结和分析了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的形势和特点，力求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近十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第二个特点是本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长期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造诣较深的专家、学者，其中不少是著名的学者，还有一些是从事这个领域教学和科研的年轻的博士，对其研究对象有专门的较深入的研究。

2 ◆ 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

第三个特点，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强调实事求是地反映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很自然地形成对有关基本问题的共识，也很自然地在一些问题看法上有差异。根据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方针，编辑本书时保留了不同提法和见解。

由于本书成书的上述特点，个别章节的个别段落会有重复和交叉，作为整个的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某些方面的内容尚有欠缺，也会有其他不妥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黄宗良、林勋健

2002年4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冷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	(1)
一、理论创新与体制创新	
——世纪之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二、在革新开放中探索前进的越南社会主义	(28)
三、逐渐走向开放的朝鲜	(48)
四、走向全面革新的老挝	(58)
五、古巴的改革开放历程、成果和特点	(66)
六、社会主义国家仍面临艰巨的改革任务	(83)
第二章 冷战后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运动	(85)
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	
理论、实践与前景	(85)
附：麦德维杰夫教授在北大讨论会上答问	(95)
二、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观与俄国的	
社会民主主义	(106)
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组织发展与理论探索	(121)
四、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138)
五、俄罗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153)
六、俄罗斯“中派主义”思潮新变化	(159)
第三章 冷战后的中东欧的社会主义	(170)
一、东欧转轨进程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170)
二、后冷战时代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运动”	(192)
三、冷战后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成功与失败	(209)
四、世纪之交的东欧左派	(219)
第四章 冷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	(226)
一、冷战后西欧社会党的革新	(226)

2 ◆ 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

二、欧洲社会民主党理论和实践的新调整	(246)
三、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演变	(254)
四、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社会主义	(270)
五、法国社会党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	(273)
六、法共的变革和“新共产主义”理论	(299)
七、从意大利共产党到左翼民主党	(307)
八、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及其政策主张	(334)
九、冷战后澳大利亚工党的调整与变化	(345)
十、西欧绿党的发展演变	(363)
十一、日本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	(382)
第五章 对苏东剧变的反思和对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总的特点和形势的认识	(400)
一、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十大关键问题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400)
二、关于苏联剧变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	(426)
三、苏联剧变后社会主义若干认识问题	(440)
四、从当前的世界矛盾与危机看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	(452)
五、世界多样化与社会主义的发展	(459)
六、冷战后国外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468)
七、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	(472)
结束语 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转折时期	(491)

第一章

冷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

一、理论创新与体制创新

——世纪之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处变不惊，冷静应对，稳定大局，坚持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一) 价值观念的根本创新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重要方针，为了从根本上防止“左”，他要求逐层深入地挖掘“左”倾僵化症的“体制根源——社会主义观念根源——价值标准根源”。其中“价值标准根源”，可以说是追根溯源到了最深层次。在价值标准、价值观念上的拨乱反正，把“思想路线——工作重心——基本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推进到更深层次，可以说是最深层次的理论突破，也是最深层次的理论创新。

价值观念上的突破与创新，集中表现为：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统一价值观，根本突破了姓“社”姓

“资”惟一价值标准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左”的僵化思潮沉渣泛起，突出问题是姓“社”姓“资”首要价值标准论在作祟，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在思想理论方面，尤其是价值观念上的集中表现。具体分析起来，这种价值观有以下三个历史特点：

简单对立——他们采用的思维方式是，凡事都要首先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贴上标签，上纲上线，归类排队，定性分档，只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一面，根本不讲这对矛盾在历史长河与中国国情中的对立统一的复杂辩证关系。

事先设定——他们认为不必经过实践检验，更不必经过冒风险的尝试，就可以把对外开放、引起外资、三资企业、股份制，证券市场等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实践，事先判定姓“资”不姓“社”。

抽象争论——他们不问国情，不问实际，不问现代化经济建设，不问国力如何，不问百姓生活，一心只问姓“社”姓“资”，整日热衷于抽象争论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问题；认为意识形态上姓“社”姓“资”的纯洁性问题，堪称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高于一切——他们把姓“社”还是姓“资”的抽象争论和意识形态标签，看成高于一切的惟一价值标准，实际上还是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那一套“左”的指导思想，用来衡量改革开放及其指导思想。

这种姓“社”姓“资”惟一价值标准论，在思维方式上是抽象的，矛头所向却是具体的，焦点集中在两大问题上：改革开放姓“资”不姓“社”，邓小平理论姓“资”不姓“社”。

这种观点，决不是一般的姓“社”姓“资”论，因为它有其特定的、确切的涵义，是不应随意混淆的；它不是一般性地问一下姓“社”姓“资”，而是把姓“社”姓“资”作为压倒一切的惟一价值标准，并直接责难中国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姓“资”不姓“社”。

如果进一步追问：这种姓“社”姓“资”论本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应当说，实质上他们判断的标准就是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教条主义：凡是符合这条标准的都一概姓“社”不姓“资”；凡是不符合这条标准的都一概姓“资”不姓“社”。

可以说,这种姓“社”姓“资”论,本质上是“两个凡是”论在 90 年代初期的新翻版:他们实质上是从姓“社”姓“资”惟一价值论出发,最终目标是非难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的回答也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以求根本突破姓“社”姓“资”惟一价值标准论;第二个层次,是借助于“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观,充分说明改革开放及其指导思想姓“社”不姓“资”。

邓小平南方谈话从四个层次上,根本驳斥了这种姓“社”姓“资”惟一价值标准论的僵化观念: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简单对立起来,预先设定中国应当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落后国家的主要特点,就是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而总体上又相当落后。早在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他就反对脱离落后国家长期存在的多层次经济结构的实际,过分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① 社会主义初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奢求清一色的纯社会主义,只能是多层次经济结构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发展“三资”企业的必要性,乃至吸收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的必要性。这些东西的价值,怎么能用姓“社”姓“资”来简单衡量呢?对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探索中的许多新事物,预先设定姓“社”姓“资”,预先划定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符合实践论的精神,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精神,更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精神。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的是敢闯敢试的实践创新精神:“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

^① 列宁:《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载《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78 页。

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① 如果按照传统计划经济与“左”的教条主义的尺子，预先设定姓“社”姓“资”的框子，改革开放就无法进行，就不能真正迈开步子。

抽象地争论姓“社”姓“资”，根本阻塞了落后国家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由之路。1918年3、4月间，列宁发表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篇纲领性文章，他提出了一条历史性任务和必然性道路：“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② 在起草这篇文章的大纲中，列宁甚至列出了这样一个从“世界历史性存在”高度看社会主义的独特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 + + = 总和 = 社会主义。”^③ 中国国情近似于俄国，在经济文化上比俄国还要落后，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最大的历史性难题就是怎样从前资本主义落后状态出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条不可逾越的历史必由之路，就是要大胆引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1985年，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这篇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

^①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

^②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171页。

^③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

展生产力。”1992年南方谈话，把原先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条历史必由之路说得更明确、更透彻：“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 如果我们做任何事，都要事先分清姓“社”姓“资”，姓“资”者一概不用，岂不是预先堵死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由之路？

姓“社”姓“资”是对立统一的复杂辩证关系，还有不少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中介环节、中性手段，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中国改革开放完全可能把原来姓“中”的、乃至姓“资”的现代化要素，转变为姓“社”的总体性的一部分。当时曾任上海市委书记，陪同邓小平视察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生动具体地记叙了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视察上海高新技术开发区贝岭公司时的一段对话，极其鲜明地体现了邓小平所讲的姓“资”姓“社”辩证法真谛。贝岭公司是中方绝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吸引了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等参股合营。在参观集成电路生产工艺时，吴邦国同志向小平汇报说，发展中国高新技术有三条路，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买技术，三是中外合资。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合资、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可以大大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这时，总经理陆德纯同志指着一台大系统离子注入机说，这是集成电路生产的关键设备之一，就是通过合资第一次引进的。姓“社”姓“资”问题正是小平同志长期思索的大问题，小平同志沉思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指着离子注入机问他们，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当他们正在发愣，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的时候，小平同志胸有成竹地接着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它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资”可以转化为“社”，“社”也可能转化为“资”。对外开放就是

^①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①。这一段话实事求是，又富于哲理，说得人们顿开茅塞，口服心服，使那种僵死对立的“姓社姓资论”难以立足。怎么能把如此复杂的、对立统一的历史辩证法简单化呢？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仅彻底突破了“左”的姓“社”姓“资”惟一价值标准论，而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标准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

“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实质是什么？应当说这是邓小平理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价值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义利统一价值观；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利”字，不能简单归结为单纯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价值观。

“三个有利于”的思想特色是什么？它主要是针对“左”倾僵化症、“左”倾空谈症提出的，更具体地说是针对姓“社”姓“资”惟一价值标准论提出的，这种历史背景、历史特点，决定了其思想特点是：功利当先，义在其中；义利统一，不可割裂；检验标准，重在实践；注重实效，不尚空谈。

“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提出的意义何在？

在这里，把价值观念摆在理论思维的突出地位，以“三个有利于”的新颖独特形式，也是为广大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统一价值观，这是邓小平理论中总揽全局的价值观念、价值目标。

在这里，超越了东西方传统价值观中功利论与道义论的对立，在

^① 见吴邦国：《牢记谆谆教导，推进伟大事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② 邓小平：《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实现了功利论与道义论的综合创新,强调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要体现功利当先,义在其中,义利统一,不可割裂的精神实质。

在这里,提出了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价值观念,为中华民族确立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弘扬民族精神,走向现代复兴,提供了深层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

在这里,根本突破了姓“社”姓“资”惟一价值标准论的“左”倾僵化价值观,为从根本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奠定了深层的理论基础。

在这里,提出了一种实事求是、具体分析、面向实践的新型价值标准,有助于人们摆脱长期以来抽象争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与思想羁绊,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念,坚持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不动摇。

在这里,为衡量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提供了崭新的价值尺度,为彻底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怎样正确理解“三个有利于”的精神实质与重大意义?

要注意防止“左”和右的两种思想偏向:“左”的观点贬低“三个有利于”的重大意义,否定它的重大创新意义和普遍指导意义;右的观点则把“三个有利于”曲解为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狭隘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简单化地把这场思想解放称之为冲破姓“社”姓“资”,甚至认为从此可以根本不管姓“社”姓“资”,放心大胆地搞资本主义就行了。

实际上,这既不符合邓小平理论的一贯思想,也不符合南方谈话本身。

1月20日,邓小平到达深圳第二天,就讲了“特区姓‘社’不姓‘资’”的问题。

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公司时,又尖锐指出:“不是有人说姓‘资’姓‘社’吗?你们就是姓‘社’”,“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2月10日,邓小平在上海贝岭公司视察时,深刻阐明了姓“资”